

# 有信仰的资本\*

## ——温州民营企业主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周 怡 胡安宁

**提要:**本文借助韦伯的双利益驱动模型及其“扳道夫”假设,通过对温州民营企业主的问卷调查,分析其慈善捐赠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及其差异。研究发现:(1)企业主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均能对捐赠行为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但(2)不同信仰在捐赠方向、形式和结果上存在明显差异,凸显了不同信仰的选择与不同利益之间的亲和性;(3)企业党组织作为外在于企业主权力的制度环境,能够通过影响企业主理念利益的作用程度,影响其慈善捐赠行为。

**关键词:**信仰 民营企业主 慈善捐赠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Marx, 1995/1887: 829)。这类将资本等同于“沾满鲜血的金钱”(Lagemann, 1989: 23)的表述在善与恶的道德评判上属于极端的“恶”,强调的是资本拥有者对非拥有者的剥削或侵占。本文关注的“有信仰的资本”则与慈善捐赠行为相关联(Bradley, 1987; Brooks, 2006),着重探讨资本拥有者对非拥有者的捐赠或给予,以及这种捐赠行为背后的利益逻辑。具体来说,本文关注温州民营企业主的捐赠行为,主要研究问题为:企业主的信仰与其捐赠行为是否关联?如何关联?

### 一、理论综述及研究框架

#### (一)有关捐赠行为的三因素界说

慈善捐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显然与捐赠人的物质利益让渡攸关。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谁主导温州的转型”(08BSH062)、复旦大学“985工程”项目“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阶层结构与社会建设:理论探索与政策含义”(2011SHKXZD00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援助,也感谢匿名评审人和编辑给予本文的建议和帮助。

那么,人们缘何能够慷慨做出利益让渡的捐赠行为?既有文献集中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宗教因素的解释。

### 1.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的分析主要侧重在国家政策、意识形态动员和政治信仰三个方面。就政府政策而言,一些研究发现,政府既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调节不平等,进而影响捐赠行动(Brooks, 2006; Curti, 1958; Garnett, 1956; Lin, 2004; Ross, 1953);也可以通过实行慈善抵税政策激励民间做公益捐赠(Eaton, 1949; Labovitz, 1974; Latcham, 1950)。就国家意识形态动员的力量而言,海内外学者共同看到,中国社会无论在应急性灾难事件中,还是在日常的济贫捐赠中,意识形态宣传的集体动员都发挥了积极而强势的召唤作用(Perry, 2007; Siu, 1990)。国家作为意识形态的引领者,能够借助媒体、教育等渠道,将“企业社会责任”(Joyner & Payne, 2002)、“个人奉献精神”(Cao, 2007)、“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官方修辞迅速灌输于民、内化于民,由此推动慈善捐赠(Wuthnow & Hunter, 1984)。其中,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公方彬, 2012; Yang, 2012)和政治忠诚(Szelenyi, 1982; Walder, 2000)与慈善捐赠行动密切相关(Bradley, 1987)。不仅党员较普通群众更积极投入捐赠,而且捐赠与否、捐赠数额也是衡量政治表现的标准之一。一些研究发现,政治信仰与慈善捐赠呈正相关关系(Layman, 2001; Pipes & Ebaugh, 2002),因为党组织能够通过内部话语和组织活动,提升党员“大公无私”的社会责任感,使其积极为社会做贡献。

### 2. 经济因素

该因素分析侧重在捐赠行为的经济理性方面,将企业家的慈善捐助看作是期待回报的投资。一种观点认为,做慈善捐赠只是企业的一种营销策略,通过慈善捐赠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改善企业效益(Brooks, 2006; Navarro, 1988)。另一种观点看到,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实现货币资本向符号资本的转化,以支票换得无形的道德声誉和地位(Acs & Phillips, 2002; Bourdieu, 1984/1979; Ma & Parish, 2006; Wilson, 2000)。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多数企业家会通过慈善捐赠,将有形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关系性的社会资本、转化为体现企业精神的文化资本、或转化为标示企业地位声望的象征资本(Brooks, 2006)。还有一种观点注意到捐赠行为与企业属性的相关性(Amato & Amato, 2007),即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资产、盈利水平、企业规模、员工数量

等企业属性将直接影响企业主的捐赠。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来说,在捐赠行为上更为慷慨(Seifert et al., 2003; 卢汉龙, 2002)。

### 3. 宗教因素

宗教因素分析的主要观点包括:(1)宗教是企业慈善捐助的决定因素之一,它通过形成企业内部独特的企业文化而使企业作出投身慈善的决策(Brown et al., 2006)。有研究看到,宗教是法律和政策之外的另一个有助于规范企业社会责任的力量(Stabile, 2004)。在个体层面上,宗教信仰、宗教教义和宗教活动将与人为善的理念内化于个体,促发个体做公益性慈善捐赠(Coleman, 2003; Iannaccone, 1997; Loseke, 1997; McCulloch, 1988; Naar, 1981; Wilson, 2003)。(2)宗教组织是慈善捐赠的直接场所,是宗教关怀社会的重要渠道(Bishop, 1912; Luidens & Nemeth, 1994; Miyazaki, 2000; Prevey, 1899)。比如,古代中国民间最早的慈善机构是佛教的“六疾馆”,运作最成功的佛教慈善机构是唐代的“悲田养病坊”(黄为军, 2013)。(3)不同的宗教教义对慈善的看法存在差异(Brekke, 1998; Cohen, 2005; Müller, 1885; Tamari, 1997)。如宗教教义中的“爱”,有基督教的“普爱、博爱”、佛教的“慈悲喜舍”和儒教的“仁爱”之别,不同“爱”所释义的捐赠内涵不同。教义在感化人心灵世界的同时,也鼓励信徒将信仰化为实践,将“财富”、“爱”与“奉献”结为一体(Bellah, 1958)。有研究表明,信仰者虔诚度越高,教义对行动的约束越明显,捐赠的激励作用亦更直接(Lin, 2004)。

## (二)理念与利益:韦伯的双驱动模型及扳道夫假设

上述3种对捐赠行为所作的因素分析未超出行动者行动的物质和精神面向,亦紧紧围绕利益。那么,什么是利益?慈善捐赠作为一种与让渡物质利益相联系的经济行为是嵌套在社会结构(Granovetter, 1985)、网织于文化结构(Alexander, 2003)中的。本文拟用韦伯的“扳道夫”(switchmen)假设去拓展利益的内涵。韦伯将利益分为两类:一是物质利益(material interests),指物质层面上与经济理性相联系的诸如收入、财富、权力等有形资源;另一是理念利益(ideal interests),指精神层面上与行动者行动相联系的理念利益,即存在于人头脑中的理想型世界观,如政治和宗教信仰等。在讨论行动者行动时韦伯主张:“直

接支配人行动的是物质利益和理念利益,而不是‘理念’,但由‘理念’创造的‘世界意象’却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物质利益驱动力所推动的行动方向”(Weber, 1978:280; Swidler,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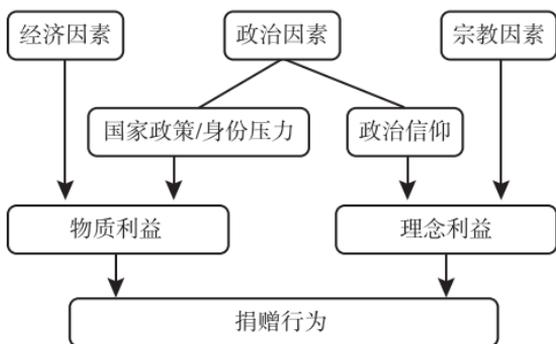
相对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来讲,韦伯的扳道夫命题显然具有以下特点:(1)强调了人在行动前或行动过程中头脑里已经形成的对物所作的价值判断;提出的是人行动过程中的物质—精神利益的双驱动模型,即如果追求物质利益的驱动力如同推动火车的动力,那么理念利益有如扳道夫将主导该动力的方向。(2)借理念利益的提出,突出了制度环境对理念利益的影响。相对于理念泛指人类社会各种束之高阁的意识形态、思想和价值观而言,理念利益则指特定制度环境下,某些理念经由行动者将其与实际行动相联系而表现出的价值观、动机和行为特征。即理念利益是与行动者、行动者的行动,以及行动者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紧密扣连的。因而,物质利益与理念利益所产生的驱动结果其实潜存于制度的脉络中。(3)在将理念和理念利益归为广义的“理念”,将物质利益归为“利益”之后,韦伯关联理念与利益的重要概念是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本迪克斯认为,韦伯用选择性亲和概念表达了理念的两个面向:一是精神理念是由个人所选择的,与选择相关;二是这种选择乃是用来符合其物质利益的,即理念扮演着强加并赋予物质利益正当性的角色(Bendix, 1977:47),“使经济谋利的观念具有一种正面被接受的基础”(张维安, 1995:120)。当然,韦伯用“选择性亲和”去统辖理念与利益的关联时,并没有否定两者间可能出现的紧张或分离。相反,他在跨文化资本主义起源的比较分析里,让我们看到的理念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是一种随历史情境和机缘而发生的紧张、分离和亲近等各种关系。如,相对西方新教伦理的理念同资本主义商业利益保有选择性亲和(Weber, 1958)而言,东方儒家、道教伦理的理念却与经商利益持有紧张关系(Weber, 1951)。

### (三)“三因素”、“双利益”下的理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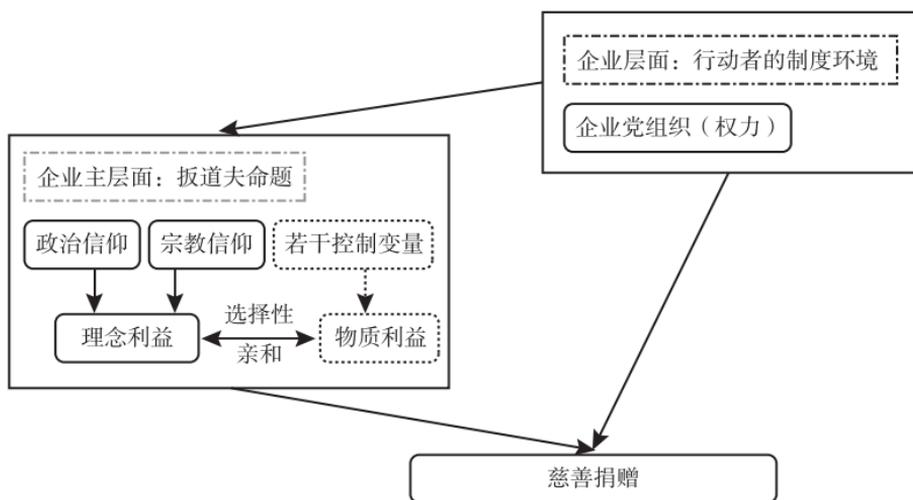
用韦伯的双利益驱动去统辖前述的三因素分析便形成本文最初的理论雏形(见图 1(a))。

然而,循“有信仰的资本”之题意,并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我们需要对理论雏形图 1(a)作进一步聚焦式的修正。

就研究题言论之,慈善捐赠本身属于物质利益的让渡,能够做出利



(a) 理论框架雏形



(b) 修正后的理论模型

图 1 理论框架

益让渡行为的支援点在捐赠者的精神理念。因此,本文侧重理念利益对民营企业主捐赠行为的影响,而将物质利益的影响作为控制变量;也拟在选择性亲和的测量中兼析物质利益的影响。即我们重点讨论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对捐赠行为的影响,然后比较不同信仰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联。

就表征物质利益的经济因素而言,我们不可否认,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之间(Weber, 1978: 926 - 939),商人(民营企业主)总是以经济利益的富足为第一考虑,并会以此为基础向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方向转移。但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长期奠定的制度环境中,

“私为万恶之源”、“重农轻商抑商”等理念根深蒂固(张维安,1995)。这种社会价值观对商人社会地位所作的负面评价,会加速推动他们往社会地位、政治权力方向的转移,例如市场转型期许多商业资本被用来买官,或用来修建祠堂等,以获取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捐赠行为中不乏这样的利益考虑,这类考虑背后的支援点是现实制度环境中依然存在的传统文化理念和社会政治地位交换的考量。而限于目前没有更好的测量指标,因此,本文用“企业是否建有党组织”这一既表征政治权力又不失地位交换涵义的指标,去测度经济因素或物质利益对民营企业主捐赠行为的影响。

就作为研究对象的温州民营企业看,两个重要的背景事实与本文密切相关:(1)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一直以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为世人瞩目。不少研究注意到,从家庭作坊起步的温州民企在其组织结构上一直存在受制度环境影响的政治特征(曹正汉,2005;史晋川等,2004;Dickson,2003,2008;Tsai,2007):企业初创期所有制形式上的“红帽子”(挂靠经营)、企业壮大期行政结构上的“红顶”(非公党建)和“红色CEO”招聘,以及民营企业主入党,进入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等。“截止2010年底,温州非公企业已建党组织3672个,非公企业党员32464人,入党积极分子12195人。温州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前茅”(管廷莲,2011:10)。这一事实对本文的启示在于,我们需要在理念利益中考虑企业主的政治信仰,也需要考虑非公党建作为一种外在于企业主个体的政治制度环境,能否制约或推动企业主的捐赠。(2)地处浙江省东南沿岸的温州,是古东瓯国的故地,其悠久的历史传递着丰富的宗教信仰文化(杨昭,1999;焦淑军,2010)。倪柝声(Watchman Nee)倡导的“地方教会”(local church)运动影响过温州的基督教文化。温州目前大约有70-110万的基督教徒,超过1200座教堂,每百万人口平均拥有10.15个教堂(洪朝晖、曾乐,2012),已成为中国拥有基督教徒比例最高的城市(Weller & Sun,2010;Cao,2007)。此外,自东晋修建崇安寺(后改称开元寺)开始,佛教进入温州。天宝年间,禅宗道场在龙兴寺的设立,使温州成为当时江浙一带的禅学中心。改革开放后随着佛寺的重建,佛教成为温州地区拥有最多信众的信仰。与此同时,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民间信仰在温州亦一直十分兴盛,主要体现在祖先崇拜、村村建祠堂,以及对众多民间“神”的祭祀活动中(杨昭,1999)。总之,温州汇集了佛教、基督教和民间信仰

的诸多神祇,是国内宗教信仰比例最高的城市。这一背景事实让本文不能绕过宗教信仰而妄谈企业主的慈善捐赠。

综上所述,图 1(b)成为本研究最终启用的理论建构模型。

藉上述讨论,本文力图在研究进路上作如下考虑:

首先,根据韦伯的双利益驱动模型,预设捐赠行为必定会受多方物质利益的驱动,但限于篇幅及研究主题,我们将物质利益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重点考察理念利益是否对企业主的捐赠行为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分别探讨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以及两种信仰体系共同对企业主慈善捐赠的影响。

其次,根据韦伯双驱动模型的扳道夫假设,通过比较分析捐赠渠道、捐赠匿名性以及捐赠奖励等代表性数据,力求证明不同理念或不同信仰将赋予企业主不同的捐赠“方向”,也以此验证理念与利益间存在选择性亲和之关系。

第三,在探究如图 1(b)所示的制度环境对企业主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本文将分析企业党组织是否可能通过对企业主理念利益的作用而影响捐赠。

## 二、数据、测量及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所做的 2011 年“温州民营企业主慈善捐赠行为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 PPS 抽样的方法,覆盖温州范围内主要的民营经济发达的市、县和区,抽样地区包括瑞安市、乐清市、苍南县、永嘉县、瓯海区和鹿城区。对受访者的选取亦充分考虑了温州企业的行业分布及企业规模。此次调查涉及包装印刷、电工电气、服装、汽配、礼品、鞋业等 10 多个行业。同时,涉及到“301 人以上,300-201 人,200-101 人,100-1 人”4 类规模不等的温州民企。受访者为企业寿命在 5 年以上的民营企业主,问卷主要调查 2008-2009 年的捐赠情况。实发问卷 7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03 份。

民营企业主“捐赠行为”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对其测量体现为两方面:被访者企业的捐赠情况和企业主捐赠时的主观意愿。用被访者的企业捐赠去表征企业主的捐赠,其原因是民营企业的所有权、管理权大多集中于企业主手中。本调查表明:82% 以上的被访者认为企业投

资、捐赠的最终决策权在董事长或总经理,其余回答为董事会。事实上,企业主一定为董事会成员,也常兼任总经理。具体的因变量测量包括5个指标:被访者的企业(1)每年的捐助数额;(2)每年的捐赠频数;(3)企业捐赠渠道——研究选取了民政部门、宗教组织和慈善组织;(4)捐赠是否公开化;(5)捐赠是否得到政府奖励。其中,前2个指标从数额和频数上客观反映企业主的捐赠状况,后3个指标反映企业主及其企业的主观捐赠偏好。我们期待从中发现理念与利益的不同关联关系。本文主要搜集和分析2008年及2009年的捐助数据,因为这两年包括汶川地震在内的灾难多发期,中国人基本都参与了捐赠。

在自变量上主要考虑2个层次,即企业主个体层面及其企业组织层面。在个体层面上,尽管企业主捐赠行为可能受诸多物质利益的推动,但本文重点考察理念利益的影响,仅在理念利益与物质利益的选择性亲和关系中关照物质利益维度。其中,理念利益是内化于个体的价值和伦理系统,在本文则指企业主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政治信仰是政党通过招募和自愿加入,成员个体能够将党的章程、思想抑或对应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化于心的行动意识。这意味着党员身份会给企业主带来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的行动意识。本文的政治信仰具体操作为企业主是否为党员。相比党员身份的公开化,在中国制度环境里宗教信仰较为隐匿。因而本文从客观宗教信仰和泛宗教行为来测度企业主的宗教信仰。客观宗教信仰由“请问您是否有宗教信仰”这一问题来测量,该问题采取二分化的回答(1=有;0=没有)。而泛宗教行为则作为一种补充,主要包括经常性看相、抽签、算命、到寺庙烧香、求巫医、看风水等与宗教有关的实践活动。在企业组织层面上,我们选择用“企业有无党组织”(1=有;0=没有)来测量企业组织的制度环境,由此判定民营企业主对外在政治权力方面的认定和受器重状况。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层面和企业主个体层面的经济因素指标。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企业当年的纳税额、企业总部是否在温州、企业员工数、企业是否有下属企业以及企业类型。企业类型主要分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作制企业、有限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企业主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企业主对政府部门、慈善组织和宗教组织的信任度,这3个变量均通过量表测量。

本文依因变量的不同分别使用线性回归分析、Poisson回归分析以及Logistic回归模型3种统计分析策略。因变量为定距的捐赠数额时,

我们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因变量为捐赠次数时,使用泊松(Poisson)回归分析策略。捐赠渠道、捐赠是否公开以及是否受到政府奖励均为二分变量,故而用常规的线性(Logistic)回归模型做假设检验。

### 三、结果分析 1:理念利益与企业主捐赠行为

以下我们在控制若干物质利益变量的前提下,分析作为理念利益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对企业主捐赠行为的影响。

#### (一)政治信仰对企业主捐赠的影响

样本数据显示:温州民营企业中有 46.38% 的董事长是党员,41.81% 的总经理为党员,50% 的企业设有党组织。民营企业家的政治信仰如此之高、非公党建的比重如此之大有其“意料之中”的缘由:一是国家政策的推动。2002 年党的 16 大修改党章以及 2003 年开启的非公党建政策,将民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行列。截止 2011 年,全国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民营企业家所占比重已达 1/3 左右;1 亿元以上资产规模的民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达到 53.2%;另有 40% 的民营企业主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厚义、吕鹏,2013:304-305)。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的比例基本上以每两年 2%-3% 的速度增长;至今约 3-4 成的民营企业已经建立党组织,其中近 7 成企业党委(支部)书记由民营企业主本人担任(张厚义、吕鹏,2013:306-307)。二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 1994 年国家企业整顿政策,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喷井式发展。在民营企业纷纷脱帽亮明身份的同时,一批国有/集体企业在“抓大放小”的政策实施中改制,一批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选择经商“下海”而加入到民企队伍中。这些国有改制的企业家、下海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是带着原有的党员身份步入民企的。因而,民营企业主为党员的比重之高,某种意义上是国有企业改制、政府官员下海的结果(Dickson,2003,2008;Tsai,2007)。温州作为民企的集聚地,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有突出表现。比如,虽然温州一直以来很少有国有企业,国有改制因素不大,但温州 1992 年以来的政府官员“下海”潮、“非公党建看温州”、“红色 CEO”的招聘等在全国有示范性的轰动效应。

那么,具有政治信仰能否作为理念利益推动企业主的慈善捐赠?图2的描述性统计告诉我们,党员企业主在捐赠的绝对数额上明显高于非党员企业主,也远超总体均值。进一步的线性回归分析表明(见表1):从模型1看,2008年企业主政治身份对慈善捐赠数额的回归系数为5.632,在0.1的水平上显著;模型2显示,2009年企业主政治身份对慈善捐赠数额的回归系数为11.12,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控制了企业和企业主的基本情况后,企业主党员身份对2008、2009年的慈善捐赠数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政治信仰能够通过影响企业主内在的价值理念,促进其慈善捐赠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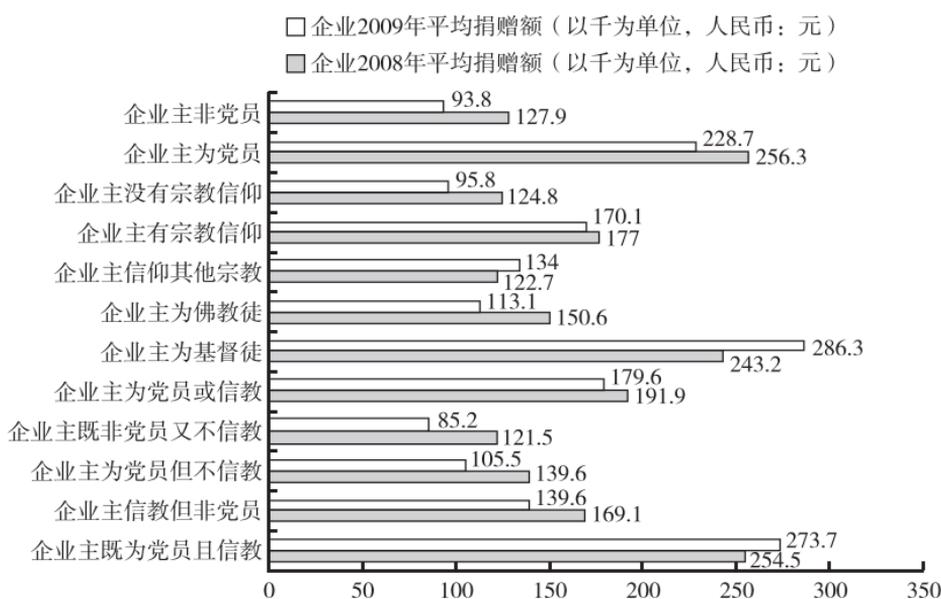


图2 2008、2009年平均捐赠数额

## (二) 宗教信仰对企业主捐赠的影响

宗教信仰文化作为温州的一个事实,同样得到了本研究样本数据的支持。在503份有效样本中我们发现:在主观测量方面,47.02%的企业主声称自己信仰宗教;在声称信仰宗教的被访者中,选择信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分别占59.25%、21.97%和6.65%。而在行为测量上,69.63%的企业主参加过宗教仪式;有过经常性的抽签、烧香拜佛、做法事、做礼拜等活动的企业主达84.76%。

表 1 党员身份、宗教信仰对捐赠数额的线性回归

	2008 年捐赠额模型 1	2009 年捐赠额模型 2
企业主为党员 (参照组 = 企业主为非党员)	5.632 <sup>#</sup> (3.910)	11.115 <sup>**</sup> (3.910)
企业主信教 (参照组 = 企业主不信教)	9.933 <sup>**</sup> (3.451)	9.196 <sup>**</sup> (3.579)
企业主参与泛宗教活动	3.992 <sup>**</sup> (1.346)	4.170 <sup>***</sup> (1.289)
企业主是党员或有宗教信仰 (参照组 = 企业主不信教且非党员)	8.536 <sup>*</sup> (4.243)	10.035 <sup>*</sup> (4.342)
四分类 (参照组 = 企业主不信教且非党员)		
非党员信教	7.464 <sup>*</sup> (5.156)	4.513 <sup>*</sup> (5.250)
党员不信教	1.301 (6.083)	2.799 (6.626)
党员且信教	14.342 <sup>**</sup> (5.072)	18.586 <sup>***</sup> (5.182)

注:(1)此表格汇报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2)#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双尾检验)。

由描述性统计(图 2)我们初步判定,企业主信教的企业捐赠数额相对较高。其中,基督教信仰者在平均捐赠额上明显高于佛教徒及民间信仰者。同样采用线性回归分析做进一步验证(见表 1):在控制了企业及企业主由基本经济状况构成的物质利益后,企业主的宗教信仰及其泛宗教行为对捐赠行为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从模型 1 和模型 2 看,2008、2009 年宗教信仰对慈善捐赠数额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9.933 和 9.916,显著性水平  $p$  值小于 0.01;2008、2009 年企业主的泛宗教信仰行为对慈善捐赠数额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3.992 和 4.170,分别在 0.01 和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宗教信仰对慈善捐赠的正向作用,即在宗教信仰这一理念利益驱动下的民营企业主会更积极投入捐赠。

### (三)两种信仰对企业主捐赠的共同影响

综上,我们分别验证了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对捐赠数额的正向影响。虽然两种信仰体系及其目标完全不同,但都是通过形成个体的理

念利益去推动企业主捐赠行为的。据此我们推测,两种信仰尽管存在极大差异,但其中存在某些诸如奉献、社会责任等构成的共享精神理念,能够与作为物质利益让渡的捐赠行为形成默契。为证明推测,我们进一步探讨两种信仰共同作用下的企业主捐赠行为。研究主要采取两种分类方法进行分析:第一种将企业主是党员或信教的企业主归为一类,剩余的归为第二类,简称为二分法;第二种方法按照2个变量的两两组合,分出企业主有宗教信仰且是党员、企业主有宗教信仰但不是党员、企业主无宗教信仰是党员,以及企业主无宗教信仰且不是党员4个类别,简称为四分法。二分法可以放大理念利益对慈善行为的作用,四分法可以分别探讨4种情况对慈善行为的作用。

图2中的二分法显示,企业主是党员或有宗教信仰的,其捐赠数额的均值明显高于既不信教又不是党员的企业主。四分法则表明,企业主为党员且有宗教信仰的,其捐赠数额明显高于其他类别,企业主有宗教信仰但非党员的捐赠数额次之,企业主是党员但无宗教信仰的捐赠数额排第三,捐赠表现最差的是非党员且无宗教信仰的企业主。

表1中,模型1和模型2在二分法下检验两种信仰对捐赠数额的影响时,企业主是党员或有宗教信仰对慈善行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8.536和10.035,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信仰的企业主捐赠数额较高。模型1和模型2在四分法下检验两种信仰的交叉影响时发现,企业主是党员且有宗教信仰的捐赠数额显著高于其他类别。

总之,两种信仰体系对民营企业家的慈善捐赠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验证,有信仰的企业主会比无信仰的企业主更热衷做慈善捐赠。

#### 四、结果分析2:不同理念利益下的捐赠差异

结果分析2试图验证韦伯双驱动模型的“扳道夫”命题——理念利益会像扳道夫一样决定捐赠行动的方向,同时印证所谓理念与利益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具体来说,我们在“如何捐”的意义上,分析两种不同信仰导致的在捐赠渠道、捐赠匿名性和捐赠奖励方面的差异,以此回应韦伯的“扳道夫”命题。

## (一) 不同信仰引发的捐赠渠道差异

“捐赠渠道”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其测量通过以下问题完成:“请问贵公司近3年来最重要的捐赠渠道是哪一个?”对该问题的回答有5个选项,分别是“民政部门”、“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基金会”和“教会和宗教组织”。为便于分析,本文对这5个选项归并为3项,即一是官方性质的“民政部门”,二是半官方性质的包括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和基金会在内的“慈善组织”,三是纯民间的“宗教组织”。根据该题器,在控制企业和企业主的一些变量后,我们分析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对于企业捐赠渠道能否起到“扳道夫”作用(见表2)。

表2 信仰与捐赠渠道、捐赠匿名性、政府奖励之间的关系

	捐赠渠道			捐赠匿名性	政府奖励
	民政部门	慈善组织	宗教场所		
企业主为党员(参照组为企业主非党员)	.366 (1.51)	.520* (2.02)	.223 (.65)	.565* (.262)	.553* (.245)
企业主信教(参照组为企业主不信教)	-.743** (-3.10)	-.0915 (-.37)	.844* (2.33)	.145 -.246	.21 (.235)

注:(1)此表格汇报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2)#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双尾检验)。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更愿意向民间宗教组织捐赠,而不愿意选择具有官方色彩的民政部门和慈善组织进行捐赠。但拥有党员身份的企业主更愿意向具有半官方性质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基金会等慈善组织进行捐赠,其次选择民政部门,最不愿意选择的是宗教组织。因而,企业主对捐赠渠道的偏好取决于企业主选择怎样的信仰。政治信仰者同正式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捐赠机构发生亲和,而宗教信仰者则青睐他们置身其中的宗教组织。

## (二) 不同信仰导致的捐赠匿名性差异

新中国成立以来,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党员,历来与“先进”、“光荣”的话语相伴,也象征一个人具备了某种积极向上的愿望。因而拥有党员身份、“党员服从组织/政府号召”、“党员带头做好事”等都习惯于向社会公开,以博民众的赞誉。相反,入教而成为教徒,或因祈求某种超现实力量而做任何泛宗教信仰的实践,都被认为是

“无能”、“匪夷所思”或“封建迷信”的表现。这使得绝大多数宗教信仰者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两种不同的信仰体系所标示的身份公开性差异,亦被投射到民营企业主的捐赠匿名性差异上。描述性统计数据表明,企业主若是党员,其捐赠趋向公开的比例为68%,匿名化捐赠仅占32%,即党员企业主的捐赠更多采取公开化形式。接着,我们使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进一步验证党员身份对企业捐赠公开化的影响,并比较宗教信仰的差异。由表2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企业及企业主的基本情况后,企业主为党员对公开化捐赠的回归系数是0.565,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主为党员的更可能进行公开捐赠;而企业主信教对公开化捐赠的回归系数则未通过假设检验。这至少说明,具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并不顾及捐赠是否公开。因而,对“捐赠是公开还是匿名”的抉择,同样取决于企业主选择怎样的信仰理念:持有党员身份的企业主与公开他们的物质利益让渡行为发生了亲和;而具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在“不在乎是否公开”的思维中,表现出他们与隐匿捐赠具有亲和性。

### (三)不同信仰收获的捐赠奖励差异

除乐于公开自己的捐赠信息之外,拥有党员身份的企业主在捐赠结果上也容易受到政府奖励;而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其捐赠与政府的关联度较小,亦不在乎是否有奖励。

由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到,企业主为党员的受奖励比例(46%)高于企业主为非党员者(32%),而企业主有宗教信仰受到政府奖励的比例(36%)几乎等于企业主无宗教信仰的比例(37%)。就此可以粗略发现,企业主为党员的企业更可能因捐赠而受政府嘉奖,而宗教信仰者则与是否受到政府奖励无关。在加入了企业总部在温州、企业类型、企业主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企业主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度4个控制变量后,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对上述结论作验证(见表2)。首先引入企业主是否为党员的变量,其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553,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主为党员的捐赠更容易受到政府奖励。其次加入企业主是否有宗教信仰的变量,而该变量在模型中并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企业主的宗教信仰与捐赠是否受到政府奖励不相关。也就是说,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在企业捐赠是否受到政府奖励上有不同的表现。因而,“捐赠能否受到政府奖励”同样取决于企业主选择怎样的

信仰理念,即持有党员身份的企业主多半能与捐赠奖励发生亲和,而宗教信仰者却常与政府奖励失之交臂。

统辖两种不同信仰所导致的捐赠渠道、捐赠公开化和捐赠奖励三方面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差异其实具有相通的内在逻辑:具有党员身份的政治信仰持有者,由于在捐赠渠道上表现为同半官方的政府慈善机构的亲和,就决定了他们可能更经常参加官方动员的公开化的捐赠活动,从而容易得到政府的嘉奖。不同的是,宗教信仰者由于在捐赠渠道上选择了民间自发的宗教组织,决定了他们捐赠的匿名化,从而与政府奖励无缘。这种相通的内在逻辑说到底表达了党员与政府权力之间具有天然共生的亲和关系,而教徒与民间宗教利益之间富有相关联的亲和;两种不同的利益亲和是受两种不同的信仰理念所支配的。由此,我们不仅验证了韦伯的“扳道夫”假设,也用实证资料呼应了韦伯有关理念与利益间的选择性亲和的观点。

除回应韦伯命题外,结果分析2还质疑了以往有关捐赠研究的若干经济学观点。以往研究经常将捐赠是否匿名、捐赠是否获得奖励同捐赠是否期待利益回报联系在一起(Bishop & Green, 2010; Wilson, 2000)。“公开”或者获得奖励被归为期待利益回报的捐赠,“匿名”而未获奖励则属于不留名而不期待回报的捐赠。前者从动机上属于追求私利,后者似乎更加慷慨无私。现实并非必然如此。首先,由上述我们已经验证的捐赠渠道、公开化和奖励之间所存在的一脉相承的逻辑看,两种信仰导致的不同捐赠路径都与各自加入的组织利益有关,并不能说谁不真正在乎利益。宗教信仰者尽管匿名、尽管未受政府奖励,但他们通过捐赠其内心所获得的由宗教体验赋予的感受性利益(Bourdieu, 1984/1979),并不亚于党员企业主获得的政府给与的精神鼓励的愉悦。其次,今天的时代,尤其是企业慈善家加入的捐赠,已经不同于以往小规模个体捐赠占主导的传统时代。当企业家将捐赠作为一种责任来实施时,他们“倾向于关注捐赠的结果,或捐赠产生的影响”(Bishop & Green, 2010:36),即关注受捐者受捐后的状况,关注捐赠是否有助于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就必然导致其捐赠的公开化。但相比之下,“受宗教驱使的捐赠动机往往仅关注捐赠能为捐赠者带来什么而不是捐赠对受捐者的影响”(Bishop & Green, 2010:36)。这就会让捐赠者本能地不在乎公开与否而选择匿名捐赠,因为下意识里他们已经为满足自身愿望付诸了努力,或已经与心灵的“上帝”有了沟通。再次,公开与否、奖励与否还取决于捐

赠者所处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前述已及,此处不赘。

### 五、结果分析 3:企业党组织对企业主理念利益及其捐赠的影响

相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的企业主往往具有自主而至高无上的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支配权。那么,当党组织进入民营企业后,在企业主的理念利益引导下的捐赠是否受企业党组织的影响,便构成结果分析 3 需要回答的问题。

#### (一)企业党组织对企业主政治信仰作用的影响

本文认为,企业主的理念利益在影响其慈善捐赠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受组织制度环境的影响,即企业有无党组织会影响企业主的理念利益功能的发挥。尤其当企业主为党员时,在道义上,党员对党组织的服从乃天经地义。因而,我们首先分析企业党组织对党员企业主捐赠行为的影响。即在结果分析 1 的模型基础上,纳入“企业是否有党组织”的变量并进行分组,分别看企业主的党员身份是否对捐赠数额有显著影响。

对 2008、2009 年民营企业捐赠情况的统计分析表明,<sup>①</sup>在无党组织的企业,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对其捐赠行为仍保持显著的正向作用,即企业主为党员的捐赠数额会更大。但模型分析也表明,在有党组织的企业,企业主的党员身份与其捐赠数额无相关性,即在有党组织的企业内,企业主党员身份的作用降低,其政治信仰不发挥显著作用。可能是因为当企业主为党员时,企业党组织完全可能替代企业主决策捐赠活动。因而,党员身份与作为制度环境中的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共生亲和,在此得到了验证,即民营企业党组织可以通过党组织与企业主政治信仰的一致性 or 亲和性而影响企业主的捐赠行为。

#### (二)企业党组织对企业主宗教信仰作用的影响

同样,将样本分为无党组织和有党组织两组,分析外在于企业主个

<sup>①</sup> 限于篇幅,模型分析表格在此略去,若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体的企业党组织对企业主宗教信仰作用效果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受篇幅所限,表格在此略去),在无党组织的企业,企业主的宗教信仰对其捐赠行为仍然保持显著的正向作用,即企业主有宗教信仰的捐赠数额会更大;而在有党组织的企业内,企业主的宗教信仰与其捐赠数额没有相关性,即该组的数据不再支持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捐赠数更大的结论。

民营企业引入党组织后,由企业主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构成的理念利益对慈善捐赠的推动作用明显式微。这一结果启发我们去思考,在有党组织的民营企业中,是否党组织代替企业主做捐赠决策?党组织对企业捐赠行为起到怎样的独立作用将构成下文分析的聚焦点。

### (三)党组织对企业捐赠的独立影响

比较捐赠频数的均值可以知道有党组织的企业捐赠次数(3.67)明显高于无党组织的企业(2.01)。为进一步探讨党组织对企业捐赠频次的影响,在引入企业总部在温州、企业类型及企业员工数3个控制变量后,用泊松(Poisson)回归分析来检验党组织对捐赠次数的效应(见表3)。

由表3可知,2008、2009年企业内有无党组织对捐赠次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56和0.423,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即有党组织的企业,其捐赠次数显著高于无党组织的企业。

接着,表4分析党组织对企业捐赠数额的影响:(1)模型1和3,没有引入企业经营效益控制变量,企业内有无党组织对捐赠数额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6.843和20.297,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但模型拟合度不好,模型3甚至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不过,可以看出有党组织的企业捐赠数额更多。(2)模型2和4,引入企业经营效益的操作变量后,有无党组织与企业的捐赠数额没有相关性,即在加入了当年纳税额后,有党组织的企业,其捐赠数额不再高于无党组织的企业。这说明,有党组织的企业在绝对捐赠数额上较高,但相对捐赠额并没有突出表现。

总之,有党组织的温州民企捐赠频次较高、捐赠渠道上更倾向政府民政部门,但捐赠数额上却没有冲高的“超额”表现。这说明:(1)有党组织的企业捐赠热情高于无党组织的企业;(2)党组织参与了企业捐赠的具体安排(频次高、更倾向捐民政部门),但企业主在接纳这种制度安排时仍握有相当的自主权(总捐赠数额的控制)。这些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公党建在温州民营企业中的作用及其地位。

表 3 企业有无党组织对捐赠次数的泊松 (Poisson) 回归分析

变量	2008 年捐赠次数	2009 年捐赠次数
企业总部在温州	-.159 (.152)	-.261 <sup>#</sup> (.145)
企业类型(参照组为个人独资及合作制企业)		
有限责任制	.561 <sup>***</sup> (.104)	.288 <sup>**</sup> (.094)
股份有限制	.674 <sup>***</sup> (.172)	.426 <sup>**</sup> (.148)
企业员工数	.0001 <sup>***</sup> (.00002)	.0001 <sup>***</sup> (.00002)
企业内有党组织	.456 <sup>***</sup> (.083)	.423 <sup>***</sup> (.081)
常数项	.432 <sup>*</sup> (.175)	.797 <sup>***</sup> (.160)
样本数	244	250
Pseudo-R <sup>2</sup>	.129	.059

注:(1)此表格汇报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2)<sup>#</sup>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双尾检验)。

表 4 企业有无党组织对捐赠额的线性 (Logistic) 回归

变量	2008 年的捐赠额		2009 年的捐赠额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当年纳税额	.024 <sup>***</sup> (.002)		.010 <sup>***</sup> (.002)	
企业总部在温州	1.940 (22.471)	3.678 (7.774)	-1.257 (21.046)	-2.756 (8.051)
企业类型(参照组为个人独资及合作制企业)				
有限责任制	21.344 <sup>#</sup> (13.221)	12.272 <sup>***</sup> (3.769)	19.550 (12.382)	11.086 <sup>**</sup> (3.871)
股份有限制	-4.917 (23.373)	-.6118 (8.686)	-1.816 (21.890)	-.550 (8.610)
对政府信任度	.689 (11.748)	2.859 (3.300)	3.439 (11.002)	1.524 (3.352)
对慈善组织信任度	6.982 (9.083)	-1.130 (2.505)	5.241 (8.507)	-1.432 (2.574)

续表 4

	2008 年的捐赠额		2009 年的捐赠额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企业内有党组织	26.843 * (11.703)	-.805 (3.416)	20.297 * (10.961)	3.333 (3.500)
常数项	-29.676 (34.978)	-11.127 (10.701)	-27.878 (32.760)	1.949 (11.003)
样本数	381	226	381	232
Adj-R <sup>2</sup>	.013	.435	.011	.148

注:(1)此表格汇报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2)<sup>#</sup> p<0.1, \* p<0.05, \*\* p<0.01, \*\*\* p<0.001(双尾检验)。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温州民营企业主问卷调查,分析其慈善捐赠行为的内在驱动逻辑及其差异。

经由描述性统计和相应的回归模型分析,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为:(1)企业主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均能对其捐赠行为产生积极推动作用。(2)不同信仰者在捐赠方向、形式和结果上存在明显差异:拥有党员身份的企业主在捐赠渠道的选择上偏重半官方的慈善组织、乐于做公开化的捐赠,并经常受到政府的奖励;而具有宗教信仰的企业主多半选择宗教组织作为捐赠渠道,在不在乎捐赠公开化的同时从未受过奖励。(3)企业党组织作为外在于企业主个体权力的制度环境,能够通过影响企业主理念利益的作用而影响其捐赠行为,但这种影响受到限制。

上述得自温州田野的有关民营企业主捐赠行为的研究及其研究发现,其学术价值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在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应用并且验证了韦伯的双利益驱动模型。韦伯对个体行动的最为著名的论述之一便是通过“扳道夫”隐喻指出了行动背后物质利益和理念利益的双重动因。然而,正如斯威特伯格所说,韦伯的这一隐喻“虽然经常被引用,但却很少得到重视”(Swedberg, 2003:10)。即使在专门探讨韦伯社会学理论的相关著述中,双利益驱动模型中的这两类

利益也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对待。很多社会学者更倾向于突出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而忽视理念利益(如 Gerth & Mills, 1946; Bendix, 1977; Blau, 1996; Collins, 1986)。在这一背景下,几乎没有经验研究真正探究过在控制了物质利益的情况下,理念利益何以对人的行动发挥作用。这种忽视显然同韦伯提出双利益驱动模型的本意相违背。众所周知,作为诠释社会学的鼻祖,韦伯倾向于通过理解行动背后的意义来解释社会行动,而这种意义更多来自于他所说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或理念,而非马克思传统所强调的物质利益。正因为如此,伊斯特伍德才将生活意义和价值称为个体的最基本需要(即所谓的理念利益),物质利益则从属于其后(Eastwood, 2005)。考虑到理念利益在整个韦伯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已有的社会学研究对这一概念的长期忽视,本研究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背后的双利益驱动所做的考察,无疑是在用经验事实验证或展示了韦伯理论的学术价值。

其次,除了理论层面上的贡献,本研究对理解中国企业家的捐赠行为也极富启示价值。作为市场商业行为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家的主要行动动机在于谋求利润。而这种动机,在表面上与企业“无私”的利他性捐赠直接冲突。由此,国内外很多研究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来理解为什么逐利的企业家会乐于参与社会捐赠(如 Zhang & Keh, 2010)。在各种已有研究中,一个主流的解释是,企业的捐赠行为本身也是其追求自身利益的重要策略之一。这类解释在前述我们归纳的“三因素”界说中已有较多提及。除此之外,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我们亦看到,基于国内 A 股上市公司在汶川地震后捐赠行为的分析,山立威等人(2008)指出企业捐赠行为背后的广告自利动机,而高勇强等人(2012)发现,我国民营企业是通过慈善来掩盖或转移公众对企业其他不当行为的关注。这些发现固然有其揭示客观事实的一面,但这种基于物质利益的解释真能涵盖企业捐赠的全部动因吗?是否企业展现社会责任的行为仅为一种“作秀”而非真正受利他理念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单以捐赠行为获取物质利益的大小来测度,而应当从支持企业家捐赠行为的理念和价值入手,这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所在及其独特贡献。

第三,本研究的相关发现颇具政策启示价值。在展现企业捐赠行为背后的理念利益后,本研究考察了物质利益与理念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韦伯意义上的“选择性亲和”(Weber, 1958: 120)。即日常生

活中的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理念(价值观、信仰等),但某一理念必定同某一特定取向的(物质)利益发生亲和。比如,捐赠这一表征物质利益让渡的行为,当捐赠者具有政治信仰时,政党利益便自然成为其行动的准绳。显然,这方面的考察能够让我们发现什么类型的物质利益和什么类型的理念利益可以更好地匹配在一起,以共同促进企业的捐赠。除此之外,我们也认为,个体所具有的不管是理念的选择还是理念与利益的亲和,都深嵌在组织制度环境中并受制度安排的影响(DiMaggio & Powell, 1983; Granovetter, 1985)。本文证实企业主的慈善捐赠行为受到企业自身的组织环境即党组织政治权力的影响。这些分析无疑为政府的社会治理政策提供了某些着力的方向,即指出了如何依照不同理念利益与物质利益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以及适宜不同亲和状态的企业环境,来优化不同捐赠动机之间的组合,以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促进公益事业。

最后,本文的研究发现还和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的社会实践相辅相成。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成功完成了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1978-2000年),并迎来了市场力量盛行、民企支撑半壁江山的经济发展高峰期(2000年至今)。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直接生长于自发的资本发育与资本竞争,而是源自再分配经济体制,是“顶层设计”主导下试错式“边缘革命”的意外结果。市场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极富成功的“双轨制”(价格双轨和所有制双轨),以及“二元改革渠道”(政府引导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改革和草根推动的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改革),构成了中国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科斯、王宁,2013:213)。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政府和民间“双强”的通力合作,成就了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成功(Zhou, 2013)。本文用民企捐赠的事例及其数据,呼应了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的改革实践。在我们的研究结论中,两种不同理念并存的事实,以及它们共同推动慈善捐赠事实,印证的是来自国家政府一贯坚守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理念和来自民间自发产生的宗教理念的共存及其作用;而两种不同信仰导致不同的捐赠渠道,继而表现出的公开化、奖励方面的差异,以及党组织对企业主理念作用的影响等,都让我们确证与“顶层设计”相关联的中国政治,依然对民间社会行动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支配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民营经济中有所限定,因为民营企业主在接受外来制度安排时握有相当的自主权力。

## 参考文献:

- 曹正汉,2005,《观念如何塑造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高勇强、陈亚静、张云均,2012,《“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 公方彬,2012,《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新华网《重新解读政治信仰》([http://sdqyxc.dzwww.com/jrdd/201210/t20121011\\_7794284.htm](http://sdqyxc.dzwww.com/jrdd/201210/t20121011_7794284.htm))。
- 管廷莲,2010,《温州行业性社团党建工作研究》,金浩、王春光主编《2010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洪朝晖、曾乐,2012,《空间宗教学与中国基督教教堂短缺研究》,美国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2012暑假学术工作坊演讲报告。
- 科斯、王宁,2013,《中国变革: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
- 黄为军,2013,《中国古人怎么做慈善》,《北京晚报》5月6日。
- 焦淑军,2010,《温州民间神祇信仰状况与发展趋势》,金浩、王春光主编《2010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卢汉龙,2002,《企业捐赠调查报告》,马伊里、杨团主编《公司与社会公益》,北京:华夏出版社。
- 山立威、甘梨、郑涛,2008,《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经济研究》第11期。
-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2004,《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杨昭,1999,《温州的地方神信仰》,《世界宗教文化》第3期。
- 张厚义、吕鹏,2013,《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分化与政治面貌变化》,陆学艺、李培林、陈光金主编《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维安,1995,《文化与经济:韦伯社会学研究》,台湾:远流图书公司。
- Acs, Zoltan J. & Ronnie J. Phillips 2002, “Entrepreneurship and Philanthropy in American Capitalism.”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3).
- Alexander, Jeffrey 2003,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mato, L. & C. Amato 2007, “The Effects of Firm Size and Industry on Corporate Giving.”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72(3).
- Bendix, Reinhard 1977,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llah, Robert 1958, “Religious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4.
- Bishop, Samuel H. 1912, “The Church and Char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8(3).
- Bishop, Matthew & Michael Green 2010, *Philanthro-capitalism: 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 Blau, Judith 1996, “The Toggle Switch of Institutions: Religion and Art in the U. 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Forces* 74(4).
- Bourdieu, Pierre 1984/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adley, Ian 1987, *Enlightened Entrepreneurs: Business Eth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England: Lion

Hudson Plc.

- Brekke, Torkel 1998, "Contradiction and the Merit of Giving in Indian Religions." *Numen* 45(3).
- Brooks, Arthur C. 2006, *Who Really Cares: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Compassionate Conserv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own, William O., Eric Helland & Janet Kiholm Smith 2006,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Practices."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2.
- Cao, Nanlai 2007, "Christian Entrepreneurs and the Post-Mao State: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Sociology of Religion* 68.
- Cohen, Mark 2005, "Introduction: Poverty and Charity in Past Time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5.
- Coleman, S. J. 2003, "Religious Social Capital: It's Nature, Social Location, and Limits." In Corwin E. Smidt (ed.), *Religion as Social Capital: Producing the Common Good*. Waco, T. 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Randall 1986, *Max Weber: A Skeleton Key*.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Curti, Merle 1958, "American Philanthropy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merican Quarterly* 10 (4).
- Dickson, Bruce J. 2003,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8,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aul J. & Walter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 Eastwood, Jonathan 2005, "The Role of Ideas in Weber's Theory of Interests." *Cristal Review* 17.
- Eaton, Berrien C. 1949, "Charitable Foundations, Tax Avoidance and Business Expediency." *Virginia Law Review* 35(7).
- Garnett, A. Campbell 1956, "Charity and Natural Law." *Ethics* 66(2).
- Gerth, H. H. & C. Wright Mills 1946, *Preface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 Iannaccone, Laurence R. 1997, "Skewness Explained: A Rational Choice Model of Religious Giving."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6(2).
- Joyner Brenda E. & Dinah Payne 2002, "Evol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 Study of Values, Business Ethics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41.
- Labovitz, John R. 1974, "The Impact of the Private Foundation Provisions of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69: Early Empirical Measurement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1).
- Lagemann, E. C. 1989,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Philanthropy, and Public Policy*.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Latham, Franklin C. 1950, "Private Charitable Foundations; Some Tax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98(5).

- Layman, Geoffrey 2001, *The Great Divid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in, H. Y. 2004, "Warlord, Social Welfare and Philanthropy: The Case of Guangzhou under Chen Jitang, 1929 - 1936." *Modern China* 30(2).
- Loseke, Donileen 1997, "The Whole Spirit of Modern Philanthrop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 of Charity, 1912 - 1992." *Social Problems* 44.
- Luidens, Donald A. & Roger J. Nemeth 1994, "Social Sources of Family Contributions: Giving Patterns in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36(2).
- Ma, Dali & William L. Parish 2006, "Tocquevillian Moments: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by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Social Forces* 85(2).
- Marx, Karl 1995/1887, *Capital (Volume one):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Capital*.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Culloch, G. 1988, "Faith, Hope and Charity: Russellian Thoughts Defended." *Analysis* 48(2).
- Miyazaki, Hirokazu 2000, "Faith and Its Fulfillment: Agency, Exchange, and the Fijian Aesthetics of Comple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27(1).
- Müller, F. M. 1885, "Buddhist Charity."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40(340).
- Naar, Joseph L. 1981, "The Patterns of U. S. Private Philanthrop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40(2).
- Navarro, Peter 1988, "Why Do Corporations Give to Charity?"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61(1).
- Perry, Elizabeth 2007,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China Journal* 57.
- Pipes, Paula F. & Helen Rose Ebaugh 2002, "Faith-Based Coalitions, Social Services, and Government Funding." *Sociology of Religion* 63(1).
- Prevey, E. C. 1899, "Economic Aspects of Charity Organiz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4.
- Ross, Aileen D. 1953, "The Social Control of Philanthrop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5).
- Seifert, Bruce, Sara A. Morris & Barbara R. Bartkus 2003, "Comparing Big Givers and 24 Small Givers: Financial Correlate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45(3).
- Siu, Helen 1990, "Recycling Traditio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s of South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
- Stabile, Susan J. 2004, "Using Religion to Promot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Hein Online's Law Journal Library* (<http://home.heinonline.org/>).
- Swedberg, Richard 2003, *Principles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 Szelenyi, Ivan 1982,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 Socialist Socie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 Tamari, Meir 1997, "The Challenge of Wealth: Jewish Business Ethics."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7.

- Tsai, Kellee S. 2007,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der, Andrew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m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2).
- Weber, Max 1951,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ller, Robert & Yanfei Sun 2010, "Religion: The Dynamics of Religious Growth and Change." In J. Fewsmith (ed.), *China Today, China Tomorrow: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Wilson, Bryan 2003, "Salvation, Secularization, and De-moralization." In Richard K. Fenn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of Relig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Wilson, John 2000,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 Wuthnow, Rober & James Davison Hunter 1984, *Culture Analysis: The Work of Peter L. Berger, Mary Douglas, Michel Foucault and Jurgen Habermas*. New York: Routedge & Kegan Paul Ltd.
- Yang, Fenggang 2012,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Jianjun & Hean Tat Keh 2010, "Interorganizational Exchanges in China: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6(1).
- Zhou, Yi 2013, "State-Society Interdependence Model in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Farmers' City in Wenzhou the Early Reform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1).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杨 典